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

当代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相对薄弱的原因，主要还是在对于它赖以产生的政治、文化根源的复杂性认识不够，或者说对其与民族主义政治策略、民族国家文化建构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

民族形式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文化、民间形式的内在关系，使文艺民族形式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

石凤珍 著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

石凤珍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石凤珍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12

ISBN 978 - 7 - 101 - 05981 - 6

I. 文… II. 石… III. 文艺 - 民族风格 - 研究 - 中国 - 1938 ~ 1942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5211 号

书 名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

著 者 石凤珍

责任编辑 侯笑如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6 $\frac{3}{4}$ 插页 2 字数 226 千字

印 数 1 - 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981 - 6

定 价 40.00 元

序

陶东风

石风珍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的。回想起它的诞生和成长经历,不仅小石,我也非常感慨。

论文的选题非常关键,选题直接关系到论文研究的学术价值。为此,第一年我要求学生主要是看书,选择题目要慎重。按照学校的规定,小石的选题是在2002年下半年进行开题。然而不巧的是,第二学年一开学,我即被派往国外讲学一年。当时正是小石为论文选题苦恼的时候,那时“非典”肆虐中国,特别是北京。北京人的恐慌和紧张越过太平洋,对于我也造成了强烈的震撼。我可以想象小石的情绪一定低落到了极点。于是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开始反复思考斟酌选题。经过反复协商,我们选择了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文艺“民族形式”的争论。这个讨论大约开始于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提出了“民族的形式、国际主义的内容”、“创造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文化建设的设想。1939年初,延安文化部门和文艺界领导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发起了文艺“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运动迅速扩展到重庆、香港、桂林、上海等地。到1942年5月(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标志),这个讨论历时三年多,发表文章无数,在文艺思潮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值得深入研究。

当然,这个课题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数量。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体现了中国现代性进程和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这就是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紧张或现代化和民族化的悖论。现代化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难以与西方化脱离干系,在“五四”以降的知识分子乃至大众心目中,摩登、新潮(也就是所谓“现代”)的东西就是西化的东西;中国自己的东西则是传统的。这样,

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和传统决裂,它同时不可能不意味着(程度不同的)西方化。问题是这个先进的、现代的“西方”不仅仅是一个民主的、科学的西方,而且是侵略的、扩展的西方,不仅仅是老师而且也是“敌人”(殖民者)。这样,中国的政党、知识分子和大众,对于这个“西方”,同时也对“现代”就必然抱有非常复杂的、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不现代化不行(要挨打),不坚持民族性(或者完全西方化)也不行(中国就不是中国了)。我们要现代化,但要的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样,我们就必须在悖论中开辟道路:既要现代化又要民族化。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的文艺“民族形式”运动,我认为就是在寻找这样一条兼顾现代化和民族化的文化建设道路。正如小石在绪论中说的,这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开端,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化建构的历史起点,是中国文艺现代化道路由‘五四’个人文艺向大众文艺方向发生切实改换的历史转折点”。五四文艺(当然也包括整个文化)的主流不仅是个人的,而且也是西化的,但是这个局面自“民族形式”的讨论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民族化、民族性(所谓“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老百姓喜闻乐见”等)被提到很高的、甚至超过现代性、现代化的程度。在这个争论中,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文化建设目标应该是:新的中国文化不仅是现代的,而且是民族的,而在当时的语境中,民族的就是大众的,就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不是知识分子腔的,不是个人主义的。这个定位在当时具有抗战的背景,抗战需要全民动员,需要文艺去鼓动百姓、特别是农民,所以,文艺的形式必须适合他们的口味。但是把民族化简单地理解为农民化,从此开始了对于知识分子及其文化的长时间的批判,其负面的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小石自己在绪论中说,她的这个课题,即清理和研究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一次集中而全面的检视,是对中国百年文学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深刻回望与反思。这是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研究的历史意义,也是本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立论根基”。我觉得这个定位是准确的、到位的,我要补充的是,这也是这个课题在当前的现实意义所在。因为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依然没有完全解决现代化和西方化、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这个既棘手又躲不开的难题。

在我的学生中,小石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学生。每逢节假日,她总是不忘记带着师弟师妹来看我,组织聚会,其乐融融。我非常感谢她为师

弟师妹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使他们成为一个非常团结的群体。

小石上进心强,学习和工作都很刻苦,也很善于和别人交往,我相信她的前途是光明美好的。在她的论文即将成书之际,特作此序。

陶东风

2007年5月15日

目 录

序	陶东风 1
绪 论	1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3
二、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9
三、研究方法	9
四、本书的主要观点和内容构架	10
第一章 文艺“民族形式”:民族主义的文化诉求与 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	13
第一节 背景:民族主义政治转变影响下的 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诉求	16
一、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策略转变	16
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诉求	24
第二节 文艺“民族形式”运动的发起及任务	35
一、在新形势下新的文艺运动的酝酿、发起及任务	35
二、从“旧形式”到“民族形式”	43
三、“旧形式”与“民族形式”的符号意义	47
第三节 “民族形式”命题的理论来源与理解	51
一、斯大林的“民族文化”与“民族形式”理论	54
二、毛泽东对“民族形式”的理解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59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民族 国家的文化认同与构建	65
第二章 论争焦点之一: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	77
第一节 对“五四”新文学评价的情况考察分析	79

一、运动发起者对“五四”新文艺的评价	80
二、“五四”新文学是否是“民族形式”	90
三、“洋八股必须废止”与民族性	96
第二节 “欧化”与语言民族主义	101
第三节 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紧张与意识形态转变的需求 ..	106
一、中国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的悖论冲突	106
二、文学所属意识形态转变的需求	109
第三章 论争焦点之二：“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争	113
第一节 “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的论争概况	115
一、“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与“新的国粹主义”	119
二、“旧命题”、“新命题”与“五四”新文学的阐释	122
第二节 “现实主义中心源泉论”与	
胡风的“五四传统—现实主义”阐释框架	132
第三节 向林冰“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的	
内在理路及思考	142
一、大众形式 = 民间形式 = 民族形式的等式构建	143
二、大众—知识分子关系地位的“重新配置论”	149
三、评价与反思	155
第四章 文艺“民族形式”运动：中国文学现代化道路的转折点 ..	159
第一节 从个人主义文艺到集体主义文艺的转变	161
一、从“左翼”文艺大众化讨论	
到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	161
二、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历史突破	164
三、文艺“民族形式”运动的历史转折点意义	174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阶层分化与地位转变	177
一、葛兰西的“领导权”与“有机知识分子”理论	178
二、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与	
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84
三、知识分子阶层分化、地位转变与思想改造	193
第三节 创立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性的新模式	217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对“五四”新文化的	

马克思主义改造	218
二、延安文艺的现代化及文艺“民族形式” 运动的历史作用	224
结 语	227
相关历史资料索引	235
参考文献	249
后 记	254

绪 论

绪 论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民族形式和国际主义的内容”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出“创造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号召。1939年初,延安宣传部和文艺界领导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组织发起文艺“民族形式”运动。运动影响很大,迅速由延安扩展到重庆、香港、桂林、上海等地。1940年底,重庆围绕“民族形式”创造的中心源泉掀起激烈论争,将运动推向高潮。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各地论争逐渐平息。论争前后持续三年多时间,最终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

文艺“民族形式”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艺运动,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开端,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化建构的历史起点,是中国文艺现代化道路由“五四”个人文艺向大众文艺方向发生切实改换的历史转折点。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会聚了“五四”新文学发生以来的各种理论问题,是新旧交会碰撞的历史漩涡。文艺“民族形式”论争也是当代文艺“民族化”、“本土化”论争思潮的历史源头。有鉴于此,对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所涉问题的辨识和清理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一次集中而全面的检视,是对中国百年文学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深刻回望与反思,这是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研究的历史意义,也是本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立论根基。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相对于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所具有的文学史地位和影响意义来说,中国当代学术界对这一思潮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研究认识深度不足,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提高。

目前所知唯一的研究专著还是胡风于1941年出版的《论民族形

式问题》一书。由于胡风本人即是论争的主要参与者、当事人,加之囿于身处其中所受到的视野、立场及当时理论方法的局限和制约,因此,这部著作与其说是对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研究专著,还不如说是他个人参与论争持有的观点意见更为妥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风这本论著及其本人,已经成为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所以说,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专著还有待于当代学者进一步创造,以弥补这项学术研究成果的不足。

现行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对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忽略现象严重。固然,各种版本的文学史教材都会给它留下一席之地,但我们从中往往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剪影,近年出版的两种“面向 21 世纪教材”可以清楚地显示这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 - 1997》(高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版),对这一思潮的描述只有 300 多字,甚为简略:论争本来在五个地区展开,该书只介绍了国统区的论争情况;论争的问题本来很多,该书只论及一个如何看待“民族形式”来源的问题;发起并参与论争的人物很多,该书只提到向林冰、葛一虹、郭沫若三人。这种叙述只能说一笔代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7 月版),也只用了 800 字介绍,提到六个人,简单说明了几个区域论争的情况,比上一稿本略详一点。文学史教材这种过于简略的交代只能说聊胜于无,只能进一步证实对“民族形式”论争的忽略程度。

相对而言,当代文艺思潮史和文艺论争史著作中的相关叙述比教材显得充实丰满了许多,但大多是以史的线索勾勒为主,论的成分薄弱,认识不够深刻。如张大明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5 年版),对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叙述篇幅约 15000 字,归纳出四个论争的焦点问题,对其中代表人物的言论及其文章观点都有所介绍。廖超慧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武汉出版社 1997 年 2 月出版),叙述篇幅约 15000 字,在对论争背景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解放区的讨论和国统区的论争分别介绍。这两部著作的共同长处是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较好梳理和归纳,不足则在于编者的立论和评价略少,对这一文艺思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开掘不够深入。许志英、邹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4 月出版),相关论述约 16000 字。这部论著的长处在于采用了较为新颖的视角,将论争置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大背景中,着重分析

它产生的国内政治斗争形势,说明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然而,由于不是以“民族形式”论争为中心组织材料,突出强调“民族主义思潮”的时代背景,使论述显得散乱,令人无法清晰把握作者所论“民族形式”的价值和意义。总之,也许是受文学史侧重于宏观把握的叙述方式和篇幅限制,这类思潮史著作整体上是以前历史事件的整理和描述为主,线条粗略,不能深入到论争内部对其构成因素进行细致剖析,加之采用传统的文学史研究视角和方法,在一些问题上说法大致相同,观点似乎陈陈相因,结论草率,未在史料的基础上做出更有力的论证,影响了研究深度和水平。

比起文学史的宏观把握,一些单篇的学术论文则在具体问题上较为细致深入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学术领域整体复苏和繁荣,关于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先后有十几篇论文刊载出来,显示出学术界对这一文学史现象的重视。这一时期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具有不同特点。20世纪80年代前期,主要是就以往对“民族形式”论争的评价展开讨论。围绕对“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理解,围绕对主要人物陈伯达、艾思奇、周扬、郭沫若、胡风、向林冰等人的评价是否恰当等问题,展开学术争鸣探讨。争鸣由刘泰隆的《关于民族形式论争》(《学术论坛》1980年第3期)和《试谈民族形式论争的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1期)引起,丁柏铨就其观点发表商榷文章《〈论民族形式问题〉应当得到更准确的评价——与刘泰隆同志商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3期),其后,戴少瑶发表《“民族形式”论争再认识》也加入到商榷和辩论之中。这次争鸣讨论,开启了对文艺“民族形式”论争重新认识和研究的新方向,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当时采取的主要还是传统研究方法,即局限在“文本”之中就事论事,侧重于对研究对象的观点与言论进行是非判断,并且往往以今人的衡量标准去做出评判,或多或少忽略了当时人言说的历史语境,如简单地以为提倡旧形式就是复古倒退、以为否定“五四”就绝对错误给以批判,而没有从文学以外查找原因,如追问:为什么要提倡旧形式?为什么要“否定‘五四’新文学”?在这种研究状况下,研究者本人无形中不自觉地汇入论争潮流,加入当初的“论战”,成为“斗士”或“调停人”,不仅没有辩明问题,还另外增加了论争的“混乱”程度,实际上不能把握当时论者的真实意图,触摸不到问题的实质,所以说这一阶段的“民族形式”论争研究存在很大

局限。当然,这客观上也受到当时学术界研究方法、学术资源和理论发展水平的总体限制,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高扬的是文学的主体性大旗,所以,从文学的本体论角度去认识和观照文学现象就是势所必然。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李泽厚发表《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走向未来》1986年第2期),对“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研究部分地突破了上述框架,跳出文学本体论局限,引入社会学、政治学、思想史等视角方法,对论争中的一些观点主张、论争性质的认识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如对提倡“民间形式”的主张就不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从政治角度对其动机加以剖析:“‘民间形式’本身在这里具有了某种远非文艺本身(特别是非审美本身)所必然要求的社会功能、文化效应和政治价值。从当时的政治角度看,要进行革命的宣传和鼓励,‘旧瓶装新酒’和通俗化、大众化便是十分重要甚至是首要问题”^①,这就为进一步开拓“民族形式”研究视野提供了启示和参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民族形式”论争问题表现出空前重视,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增长上——如前面提到的几部文学思潮史就是这一时期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性等新的西方学术资源和理论方法引导下,一些较高价值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陈思和、汪晖、旷新年的研究。陈思和是从文化维度出发来认识“民族形式”论争。在《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1994年)中,他将“五四”以来的文化分为三种形态: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于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发生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民族形式’论争,正是当代文化格局变化的一个标志:民间文化形态的地位始被确立”^②。“民族形式”论争其间包含的是文化冲突的真相^③。这一“文化”观照视角,为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打开了一条与以往研究大不相同的新的通路。当然,由于仅仅从“文化形态”演变来认识“民族形式”论争的含义,在解释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发起意图的复杂性上还嫌不足。汪晖对“民族形式”论争研

① 李泽厚:《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78页。

②③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见《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29、第134页。

究堪称用力,成果也最显著。他撰写了几万字的长篇论文《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1996年),也是从前人从未涉足的领域即从方言土语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出发切入“民族形式”问题。他试图通过“民族形式”中相关问题的研究来解释一个现象——“在这次讨论中,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直接的关系,并构成了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挑战,但是这次挑战最终以失败告终,现代白话文作为一种普遍的民族语言的地位并未动摇”^①。他认为“就中国而言,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自决的过程,而且也是创造文化同一性的过程,即创造并包容地方性和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同一性……‘民族形式’的讨论就是形成和创造现代民族文化同一性和主体性的努力之一”^②。为此,论文就“地方性与全国性的问题”、“方言问题与现代语言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否定之否定”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应该说这是第一个从“现代性”和民族国家视角来观照“民族形式”论争的研究成果,它的开创意义是巨大的。尤为可贵的是,作者还就文艺“民族形式”研究提出若干问题和研究设想,体现出思索的深度。当然,这也间接说明“民族形式”论争还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和深化研究的必要。旷新年对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专门论述,包含在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2001年)中^③。他从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从民族抗战要求的文化“民族化”背景出发来认识“民族形式”的提出,也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在这一思路深入展开,而是用了许多篇幅介绍论争者的观点言论,冲淡了本该深刻的理论思考。

上述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侧重于“外部”研究,努力借鉴新的社会理论、文化资源和学术方法来重新认识“民族形式”论争。很少再看到过去那种简单的是非评判,这无疑是研究视野、方法和认识上的共同进步。但是矫枉过正,由于“侧重”外部,又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文学属性,没有将整个事件放在新文学的发展链条上来进行动态考察,没有把论争放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整体历史进程中考量,所以说,

①②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7月版,第1494、第1498页。

③旷新年:《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还有待于系统、全面推进。

目前所知,韩国和日本的学者对“民族形式”论争这一命题都发表过一些研究论文,特别是韩国学者的研究取得一定成绩,较为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学者金会峻的研究。

金会峻对“民族形式”论争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博士论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形式论争”研究》。从已经发表的部分文字可以看出,他的研究以史料收集齐备、事件呈现完整而见长。他不仅分别将各个区域(延安地区、香港地区、桂林地区、晋察冀地区等)的论争情况进行细致整理,归纳出整个论争的焦点问题,还就每一个问题内部不同的观点都加以区分,并进行一定评价。然而,金会峻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还是较为传统的,其论文主要也是以“史”为主,侧重于论争材料的归纳整理、论争面貌的尽可能完整出现,“论”略显薄弱,未能将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整体历史进程中观照,未能根据中国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挖掘出这一文艺思潮产生的政治、文化深层根源,特别是对文艺“民族形式”运动的历史意义开掘不够,认识没有达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其中某些观点和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总的来看,金会峻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掌握这段历史的全貌提供了较为丰富、翔实的史料,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参照,这是值得十分肯定的。

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表明,当代学术界对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这一思潮的重要历史价值和意义,还需要后来者进一步研究揭示。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值得特别称道。早在20世纪40年代,胡风就编辑出版了《民族形式讨论集》^①,为今天研究这一文化现象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新文学运动史料》《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卷)《延安文艺丛书》(理论卷)收录了部分论争文章。《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1938-1982)》(徐道翔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目前国内最集中和完备的关于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材料汇编,收录77篇文章,目录索引103篇。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抗战文艺研究室”整理的《“民族形式”讨论纪略》(《重庆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不仅对论争文章提供了目录,而且还有简单的内容概

^① 胡风:《民族形式讨论集》,华中图书公司,1946年初版。